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④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文化生态与地方性知识：萨满主义的本体论模式……………曲 枫 / 1

Preface……………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自然与社会因素：北极水域生态系统千年生计方式嬗变研究

…[丹麦] 克斯滕·哈斯特鲁普 阿斯特丽德·奥伯博贝克·安徒生
比耶恩·格诺诺 马斯·彼得·海特-约根森 (李乔杨译校 王政星译) / 11

西伯利亚研究

尤卡吉尔萨满教研究现状……………[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李燕飞译) / 39

萨满式的体育运动：布里亚特摔跤、射箭和赛马

……………[奥地利] 史蒂芬·克里斯特 (刘若盈 邢海燕译) / 51

满—通古斯语民族萨满的社会特征……………[俄] 史禄国 (于洋译) / 80

近北极民族研究

论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 (英雄史诗)……………赛音塔娜 / 101

敖包“官祭”的文化表达

——基于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王 伟 / 115

达斡尔族萨满传承中的两个重要环节……………金丽玛 / 129

仪式与风俗

-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升天节 唐 戈 / 137
- 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关扣尼风葬纪实 关小云 / 153
- 满族萨满教艺术中宗教元素的表达与生成 宋小飞 / 164
- 韩国巫堂股什中孤魂慰藉的普遍性及特征
——与水陆斋、甘露帧和厉祭进行比较
..... [韩] 李京烨 (耿瑞芹译) / 174

前沿观察

- 洞中意识：当考古学遇上萨满教
..... [美] 安德烈·兹纳姆斯基 (徐峰 郭卉译) / 194

书评

- 卡季奥诺夫主编《18世纪至1917年西伯利亚和远东印本地图
综合目录资料》..... 张 松 / 269
- 热列宾娜编著《西伯利亚萨满教》..... 张 松 / 271
- 谢姆著《那乃人历史民族学》..... 张 松 / 273
- 《楚科奇军事事务》——书评 齐山德 / 275
- 人与自然的实践性互动
——来自西伯利亚猎人群体的案例研究 陶金华 / 281

学术动态

- 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 关红英 / 289
- 韩国极地研究所 苏 杭 高文丽 / 294

征稿启事

-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02

CONTENTS

Preface

- Cultural Ecology and Local Knowledge: The Ontological Model of Shamanism
..... *Qu Feng*/ 1
-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Life around the North Water Ecosystem: Natural and Social Drivers of Change
over a Millennium *Kirsten Hastrup, Astrid Oberborbeck
Andersen, Bjarne Grønnow, Mads Peter Heide-Jørgensen* (Translated by
Li Qiaoyang & Wang Zhengxing)/ 11

Siberian Studies

- Research Status on Yukaghir Shamanism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 Yanfei)/ 39
- Shamanic Sports: Buryat Wrestling, Archery, and Horse Racing
..... *Stefan Krist* (Translated by Liu Ruoying & Xing Haiyan)/ 51
-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ngus Shaman
..... *S.M. Shirokogoroff* (Translated by Yu Yang)/ 80

Studies of Near-Arctic Peoples

- The Daur Morigen Story (Heroic Epic) *Saiyin Tana*/ 101
-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Official Worship of *Oboo* Cairns—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Two “Banner *Oboo*” *Wang Wei*/ 115
- Two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aur Shaman..... *Jin Limal*/ 129

Ritual and Custom

- Ascension Day on the Right Bank of Erguna River····· *Tang Ge*/ 137
- An On-the-spot Record of the Tree Burial of the Last Oroqen Shaman
····· *Guan Xiaoyun*/ 153
- The Expression and Formation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 Manchu Shamanism
Art ······ *Song Xiaofei*/ 164
- The Univers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cifying Lonely Spirits in Mudang Gut
—Centering on the Comparison with Suryukjae, Gamrodo, and Yeoje
····· *Lee, Kyungyup* (Translated by GengRuiqin)/ 174

Frontier Observation

- Mind in the Cave: Archeology Meets Shamanism
····· *Andrei A. Znamenski* (Translated by Xu Feng & Guo Hui)/ 195

Book Review

- Materials for the Consolidated Catalog of Printed Maps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1917* edited by O.N.Kationov
····· *Zhang Song*/269
- Siberian Shaman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edited by T.
Zherebina.····· *Zhang Song*/271
-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nai People: Tribal organiz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uthored By Yu. A. Sem. ······ *Zhang Song*/273
- Review on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Chukchi ······ *Qi Shande*/ 275
- Prac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 A Case Study of A Siberian Hunting Group ······ *Tao Jinhua*/ 281

Academic Events

- Ethnic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Oroqen, Inner Mongolia ·· *Guan Hongying*/ 289
- Korea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 *Su Hang, Gao Wenli*/ 294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02

萨满式的体育运动：布里亚特摔跤、 射箭和赛马*

[奥地利] 史蒂芬·克里斯特
(刘若盈 邢海燕 译)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布里亚特人传统体育运动的历史以及现存形式中的宗教因素。布里亚特人是定居于西伯利亚南部、蒙古北部和中国东北的蒙古族群。从古至今，他们的传统运动都与萨满教仪式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分析了这些体育赛事在布里亚特萨满教仪式中的功能——为什么它们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这些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传统运动被认为在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的是为了取悦或欺骗布里亚特人的神灵，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存所需之物。本文还描述了布里亚特人与他们想象中精神实体关系建构的主要历史变化，及其在体育比赛中的相应变化。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狩猎到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他们在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上的变迁：从萨满教到佛教；从苏维埃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后苏联时期萨满教和佛教的复兴。

关键词：布里亚特人 宗教体育运动 萨满教 佛教 后苏联

* 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得益于以下支持：奥地利科学共同体的 MOEL-Plus 基金（Österreichi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北方博物馆盖斯基金（Geist Fund Grant of the Museum of the North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全球变迁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hange）学生助研金、以及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研究生院的旅行补助金。

本文翻译得到 *Religions* 的授权，译自 Krist, Stefan. 2019. Shamanic Sports: Buryat Wrestling, Archery, and Horse Racing. *Religions* 2019, 10, 306; doi: 10.3390/rel10050306. www.mdpi.com/journal/religions.

的复兴

作者简介: 史蒂芬·克里斯特 (Stefan Krist),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学和布里亚特宗教。

译者简介: 刘若盈, 女,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生。

邢海燕, 女,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都市人类学。

一 引言

布里亚特人是蒙古族群的一支, 主要定居在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以西、以南和以东的俄罗斯联邦地区。也有小规模布里亚特族群居住于外蒙古的邻近地区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总计约有 50 万人。他们原称“布里亚特-蒙古族 (Buryat-Mongols)”, 因为属于蒙古族群最北端的成员, 所以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蒙古国人和中国的蒙古族都十分相近。17 世纪时, 布里亚特人的居住领地被俄罗斯帝国征服并殖民后,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族群 (Forsyth 1992; Humphrey 1983, 1990; Kolarz 1954; Krader 1954)。

除了文献资料, 本研究还基于过去 25 年来作者在特定地区进行的 16 次分别为期一到三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在此非常感谢当地所有的布里亚特人及其他居民, 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知识; 让我有机会去参与观察、拍照并以他们为对象摄制影片等等。其中我的大部分田野调查也得到了当地科研机构的支持, 其中, 要特别鸣谢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蒙古、佛教与藏学研究所以及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州立大学的支持, 感谢所有的领导和同事们。

就地理关系而言, 布里亚特人的居住领地位于横贯亚洲的草原与针叶林之间的过渡地带 (即西伯利亚北部森林), 这里的地貌景观与蒙古国人和中国蒙古族的居住地非常迥异。在那些地区, 很少有森林, 但布里亚特人居住地的地貌特点是草原和森林交替, 所以很少干旱与荒芜。因此, 不同于其他的蒙古部族, 狩猎在布里亚特人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也会进行渔猎, 尤其在贝加尔湖一带渔猎尤为流行, 但这项活动却被其他蒙古人所轻视。此外, 布里亚特人的北方邻居——西伯利亚原住民群体, 也属于针叶林地带的游猎民族, 历史上布里亚特人与这些群体也曾有过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上述这些条件既影响了布里亚特人的传统宗教信仰, 也影响了他们的传统体育运动。与其他蒙古人相比, 狩猎在布里亚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使萨满教对他们的体育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提及这些体育运动及本文的分析，就有必要避免将运动狭隘地归类为纯粹的以获胜和创造记录为导向的，高度正规化、标准化、规定化和制度化的活动。此观点起源于对现代西方体育的关注，而现代体育是在工业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劳动分工、异化、阶级斗争等相关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只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体育类型，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更综合的关于运动的定义来理解传统的布里亚特运动，而不是将其局限于排外的欧洲中心论，这一观点在社会人类学中也早有确立。1985年，美国体育人类学家肯德尔·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和艾丽丝·泰勒·切斯卡（Alyce Taylor Cheska）将体育定义为：在定义和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具有强竞争性的体能锻炼活动。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仪式性的特征及游戏风格，并且具有不同程度的娱乐、工作和休闲成分（Blanchard and Cheska 1985: 60）。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体育运动都不能被归类为竞争性或游戏性的，毫无疑问，用这篇文章的一位同行审稿人的话来说，它们都有“仪式化的特征”，而传统的布里亚特运动也不例外。正如我将展示的，它们既是体育运动和竞赛，同时也是游戏和仪式。

布里亚特人的传统运动包括摔跤、射箭和赛马等具体形式。摔跤手在比赛中袒胸露背，用一根特殊的布腰带束在腰部和臀部。如果比赛在五分钟内还不能确定胜负，则必须利用布带抓住对手。这是一种站立式摔跤（即不可在地面上进行摔跤）。当一方跌倒在地或身体有三个部位接触到地面时，就会被判为失败，这是确定比赛胜负的唯一方法。此外，既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记分系统。弓箭手通常使用传统的由木头、牛角和动物肌腱混合制成的反曲弓。他们用加厚的钝头木箭（图2）射击舒里（*sury*），一种由布料或皮革制成的圆柱形软标靶，直径约6—8厘米，长约10—12厘米（图3）。其中一部分安置在地面上，距离弓箭手约30米到60米，弓箭手必须用箭射中并将其推到至少两米远之外的地方。在赛马中，男女骑手将骑在典型的布里亚特品种的马上，穿过草原，疾驰距离长约6公里到28公里。为此，马匹在比赛前要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专门训练，主要是通过控制它们的饲料摄入量以让它们适应比赛。其中会用到某些世代相传的方法，但饲养者通常会把它当做机密加以保守。

布里亚特人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一样一直钟情于“男儿三技艺”的运动，或者类似形式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们传统上以游牧为主，兼之以狩猎为辅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战事和纷争不断而决定的。然而，不管是过



图1 2010年,在伊沃金斯克(Ivolginsk)佛教寺院举行的迈达尔·呼拉尔(Maidar Khural)庆祝活动中,布里亚特摔跤手在裁判监督下比赛。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图2 2015年夏,在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中央体育场举办的苏尔哈班共和艺术节上,布里亚特的弓箭手。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图3 2010年,在伊沃金斯克佛教寺院举行的射击比赛中,一名布里亚特射手正在为他的对手们设置“舒里”,一种象征啮齿猎物的软标靶。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去还是现在，这三项运动的比赛通常都是在各种仪式庄严的场合中举行的。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世俗化的活动，但按照传统，这些场合大多是宗教性的，具有信仰崇拜的意义。因此，这些运动也有很深的宗教根源，或至少具有某种宗教功能。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 宗教体育运动

早期的研究人员，特别是人类学家对游戏和体育在仪式和崇拜方面的共同之处有着广泛共识，因为被广泛接受的关于仪式的定义是：“一种规定好的、可预测的、固定的、交流与共享的行为（Harris and Park 1983: 17）。”这个定义也同时适用于游戏和体育竞赛。而且数不胜数的历史和民族志的报告中都将体育比赛作为宗教巫术仪式的一部分，这清楚地表明，这两种人类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有些体育比赛会伴随着某种仪式，或其本身被认为是某种丰产巫术，人们试图以此来影响天气，使雨量充足，使家畜或猎物繁殖良好，或祈求庄稼能够丰收（Damm 1960: 3—5; Jensen 1947: 38; Kamphausen 1972: 94; Körbs 1960: 14）。比如过去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数北美土著部落，以及南太平洋的提科皮亚岛居民的报道等，这里仅列举三个突出的文献（Culin 1907: 484—485; Firth 1930: 67; Sands 2010: 28）。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此类个案还有很多，不仅有过去的例子，也有依然现存的例子，其中就有蒙古民族的那达慕（Naadam）运动会（Kabzin'ska-Stawarz 1987: 54），包括 *Eryn Gurban Naadana*（就像布里亚特人的“男儿三技艺 [Three Manly Games]”）。

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经常组织和参加体育比赛的场合，都与人类生命和自然周期的仪式相关（Jensen 1947: 38; Damm 1960: 8; Calhoun 1987: 76—77）。在前者中，许多成人礼都伴随着艰苦的体能训练（Körbs 1960: 14; Calhoun 1987: 64）。而在庆祝季节变化的仪式中——尤其是冬末和春至——则通常伴随着球类运动、射击、拳击、摔跤等各种比赛（Culin 1907: 483; Damm 1960: 7; Calhoun 1987: 77）。

① 作者注：在蒙古语中，这些游戏被称为“Naadam”（那达慕），以字母“m”作为结尾。而在布里亚特，这种运动被称为“Naadan”，以字母“n”结尾。

赋魅的宗教崇拜和体育比赛之间产生这种古老而广泛联系的根本原因, 在于宗教和仪式的目的和结构。正如德国体育教育家和运动科学家维尔纳·科尔布斯 (Werner Körbs) 所阐述的那样, 宗教 (cults) 是人们用来与“崇高 (the sublime)” 交谈的语言, 这种语言是“通过身体的努力, 在手势和姿势、游戏和比赛中奉献自己”(Körbs 1960: 13, 作者自译)。科尔布斯认为, 在仪式中, 人们践行有形的 (即肉体的) 努力——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身体语言, 因为这一交流方式“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无论是祈求还是赐福”(Körbs 1960: 14, 作者自译), 无论对于人们自身还是对于他们的神明而言, 都是如此。这是一种身体上的交流方式, 人们在他们的原始仪式中使用这种方式来确保他们的生存, 就像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他 1935 年的论文《身体技术》(*Les techniques du corps*) 中所阐明的那样, 这一事实有更加世俗的解释方式: “人最初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客体, 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个技术手段, 即他的身体 (Mauss [1935] 1992: 461)。”

正如美国体育人类学家罗伯特·桑德斯 (Robert Sands) 精辟表述的那样, “身体运动是人类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的确这一点毋庸置疑 (Sands 2010: 27)。桑德斯恰当地总结道: “身体运动是人类神圣和宗教的组成部分。”因此, “神圣性和后来的体育运动是由仪式和运动方式在动态的交互中演变而来的 (Sands 2010: 27)”。

通过这些“运动模式”——即通过仪式和体育活动——人们自古以来都在让宇宙和神圣的事件形象化, 让它们变得生动起来, 并且通过他们自身积极的、周期性的反复参与, 使之变得有形和可感知 (Mathys 1958: 3, 14, 23)。因此, 仪式和运动有着共同的起源, 就像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克·萨拉蒙所言, 它们都是早期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消除对未知的恐惧, 为社会做出神圣的贡献”(Frank Salamone 1977: 166)。

宗教仪式, 包括体育比赛, 都可以“为社会做出神圣的贡献”, 因为参加者相信, 仪式提供了介入善恶之神之间“神圣斗争”的可能性 (Calhoun 1987: 76)。或者更通俗地说, 在庇护者和恶魔之间,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影响他们。正如美国体育社会学家唐纳德·卡尔霍恩 (Donald Calhoun) 借助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报道所解释的那样, 体育似乎为人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因为:

在文字尚未出现之前, 人们普遍相信通过模仿或参与神的斗争, 他们可以影响斗争结果, 从而影响自己。因此, 在春季的节日中, 正当

“好”神努力维持生育能力之时，人们就会投身于竞赛——在村庄之间，在部落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已婚和未婚之间。

[……]在这场极为重要的自然斗争中，比赛运动的成功进行被认为能够博取超自然力量或生命的青睐，例如祈求所需的雨水、作物或猎物的丰收、疾病的痊愈，或是释放已逝之人的灵魂等。因此，根据类似的原理，游戏的顺利开展被认为是顺势疗法，可以增强对人类有利的力量。（Calhoun 1987: 64）

换言之，这些运动竞赛的参与者笃信并亲身参与了交感巫术。

科尔布斯提供了一种有价值且可行的分类方法，将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游戏按其功能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属于指向巫术，或者是“Kampf um etwas”，意思是“为某事而战”，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第二种则体现了宗教体育运动的象征性功能，即它们的“Darstellung von etwas”，或曰“某物的实现”。因为这些运动通常会模仿宇宙或神话事件，包括“神战”，所以他们会经常这么干。但这两种功能性的分类也可能同时存在，实际上也经常如此（Körbs 1960: 14; Damm 1960: 9）。

三 布里亚特的宗教体育运动

基于上述原因，参加模拟或象征宇宙或神话事件的体育比赛，通常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力量的战斗，或被视为干预这些战斗或“神圣斗争”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项神圣的职责（Mathys 1958: 22）。从历史上看，布里亚特人确实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传统体育运动的，今天仍然如此。通过参与运动，他们不仅试图干涉他们所信仰的超自然生物的事务，甚至直接与其互动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他们是如何达成这一目的的呢？

正如我在早先的一份出版物（Krist 2014: 425）中所记录的，在贝加尔湖及其出口安加拉河畔附近的岩石表面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作品，这些岩画是描绘了拟人化的摔跤作品。然而，这些图像中有一些具有动物的形态特征，包括头上有角，头部形状像鸟，有喙，或躯干形状像四条腿的动物。因此，这些图像很容易让人想起在同一时期著名的拉斯科（Lascaux）洞穴绘画和法国南部、西班牙等其他地方的著名洞穴绘画中所描绘的用于祭祀目的的人物，尽管二者并不完全一致（Müller 2006: 8—9）。毫无疑问，西伯

利亚南部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所描绘的是摔跤比赛的仪式 (Okladnikov 1974: 49—50, 109—11; Reshetnikov and Rabetskaya 2007)。这证明早在那个时候, 居住在那个地区的人们出于达到一种具有宗教魔力的目的, 在“进行这些体育竞赛”。

关于蒙古族三项传统体育运动的最古老书面资料可以在《辽史》中找到, 《辽史》是中国辽王朝的官方编年史, 该王朝由契丹人 (现居于中国北方, 讲古蒙古语的人) 建立, 从公元 907 年持续至 1125 年。在这部编年史中, 我们发现了关于摔跤的详细报道, 特别是在皇室萨满教祈雨仪式中举行的射箭比赛 (Wittfogel and Feng 1949: 176, 219, 277, 254, 413, 267; Lkhagvasuren 1998: 14)。

这些在辽代宫廷举行的仪式表明, 在历史上, 即便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该地区人民也一直保持着将这些体育运动用于神奇目的的做法。然而, 这些仪式表明最初为了确保生命的魔法仪式的形式在该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些仪式中, 参与者并不祈求雨水, 而是为了游戏和祈求狩猎中的好运。

在蒙古人的前佛教徒甚至是在佛教徒的信仰和神话中, 被捕猎的许多野生动物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 蒙古人认为狼、鹰、天鹅或野猪等动物是图腾 (即作为其氏族的祖先), 所以他们将自己视为此类动物的后代和亲属。因此可以理解捕猎野生动物对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 首先, 在世界各地, 狩猎和采集是人类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持续最久的获取食物的手段。随着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先发明了农作物种植之后, 大多数的畜牧业才得以出现——两者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晚 (在这里所讨论的地区, 这种情况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2000 年); 其次, 大约 3000 年前, 蒙古和中国今天的干旱草原地区还是大片的森林, 直到在那之后, 气候才从温暖潮湿的气候转变为寒冷干燥的气候, 即所谓的极端大陆性气候, 这种气候至今仍然是这个地区的特点。

基于这些原因, 到目前为止, 布里亚特摔跤手依然很自然地在他们的鹰舞 (devekh) 中模仿一种野生动物——鹰, 每次赛前他们都会表演该舞蹈, 而获胜者也会在比赛后进行表演 (图 4); 舒里 (在射箭比赛中用作靶子的皮革或布垫) 则象征着他们曾经大量捕猎的小型啮齿动物 (Dugarova 2004: 20); 而且通常在射箭运动员击中舒里之后, 裁判、观众和参赛者会唱起巴拉 (bara), 一种来赞美神射手的仪式赞歌。但更重要的是, 这首歌旨在取悦和

满足同名的虎神，她是猎人、勇士和弓箭手的守护神，人们相信她会隐身降临于比赛中（Dugarova 2004: 23）。

因此，如法国人类学家哈马扬（Hamayon 2016: 162）所言，布里亚特人从事体育活动是为了给“不可见”或“无形之物”带来快乐，以维持或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而这些活动往往是由动物神引导的^①。他们以此为目的而模仿动物，例如他们的鹰舞^②。然而，这些体育游戏和舞蹈最初只有辅助功能，意在从同时进行的萨满戏剧表演中转移神灵的注意力。通过分析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有关布里亚特集体萨满教仪式的民族志报告（每年早春时节在布里亚特“举行”的那达哈 [naadaha] 运动），哈马扬概述并揭示了这些仪式的结构、逻辑和目的。以下是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补充说明。



图 4 2018 年夏天，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行了一场摔跤比赛，两名布里亚特摔跤手正在比赛，一名摔跤手正在表演“devekh”，即鹰舞。在进行摔跤比赛之后紧接着会举行“祭敖包（oboo）”仪式。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这既是一种隐喻性的游戏，也是一种仪式，萨满会在其中模仿被狩猎的动物。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吸引并最终与另一个雌性动物神灵达成婚姻关系，以便藉由游戏从她那里得到一份充满爱的礼物（即为猎人的团队搜寻猎物）。作为这个礼物——事实上是被杀死的动物——的交换，他需要给鬼神以人类的生命，或者至少通过奉献自己来奉献人类的生命能量，因

① 作者注：这一段和接下来的四段部分基于我对罗伯特·哈马扬的著作《我们为什么玩耍》（Krist 2018: 296—298）的评论。

② 尽管布里亚特和蒙古（还有蒂瓦，甚至土耳其）的摔跤手会在舞蹈中模仿鹰，但中国内蒙古的蒙古摔跤手是个例外，因为他们会模仿狮子。

此,他通过让自己倒下,躺下不动来实现虚拟的死亡。然而,现在的团队成员及时“唤醒了”他,所以没有太多“至关重要的人类能量”被鬼神带走(即团队成员中不会有太多人死亡,或过早死亡或生病)。因此,整个行动实际上是为了欺骗神灵。然而,这被认为是确保该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参加这些活动的一项必要条件是:布里亚特萨满必须表演他的戏剧,他的团队成员也必须参加摔跤和跳舞。否则,预期的效果(如打猎成功)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Hamayon 2016)。

因此,这些游戏旨在影响“经验现实”(Hamayon 2016: 297, 299),即在萨满游戏和男子体育比赛之外的“真实世界”或“现实生活”(Hamayon 2016: 68, 115)。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所有的巫师、摔跤手和舞蹈演员每次都必须各自扮演好不同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每次都必须“定制”(Hamayon 2016: 180)自己的行为,否则,作为这个“巫术逻辑”的内在因素,鬼神既不会被运动员和舞者分心,也不能再次被萨满愚弄。

因此,这些复杂的,“规定好的,可预测的”,但又不“刻板的”,而是交流和共享的“那达”(Naadan)(在布里亚特语中是“游戏”和“玩耍”的意思),构成了科尔布斯这类宗教活动的两个类别:一场“为了”预期效果的“战斗”;一场“实现”“崇高”或“神圣”的“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同时“创造了神圣的活动”,使其“更可感知和有形”。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是隐喻性的身体表达,即隐喻性的游戏,正如哈马扬对他们的描述所切中的(Hamayon 2016: 279—294),以及科尔布斯所谓的“有形的努力(corporeal effort)”。

布里亚特人在那达中使用“身体语言”并不奇怪,因为如上所述,“身体运动是这种仪式不可或缺的”。他们使用隐喻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根本和基本手段,因为“我们的思维过程”必然以“隐喻结构”为主要特征,正如哈马扬(Hamayon 2016: 282—283)引用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话,将其定义为“从另一方面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或经验”(Hamayon 2016: 282 [引自Lakoff and Johnson 1980: 5]),人类的确一直在这样做。哈马扬解释说,“诉诸有形的或众所周知的东西”——就布里亚特人的仪式游戏和体育游戏而言,他们模仿被猎杀的动物的动作——“是让我们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原因”——在布里亚特的案例中,是动物神的领域——“而且可能是操纵它的原因”——从而使这些神灵给了人们足够的生存游戏(Hamayon 2016: 286)。

四 布里亚特经济活动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布里亚特传统体育的影响

然而，到了19世纪，在布里亚特人独有的萨满教仪式表演中发挥着直接功能（即前面提到的分散神灵的注意力）的三项体育比赛，不再是典型的季节性的、确保生命的仪式活动，而是成为了稀有的事件。当时的民族志学者对这些仪式的描述，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典型的“拯救民族志”行为。也就是说，是为了给子孙后代保存这些仪式而去记录的已有知识。他们的报告，如著名的布里亚特民族志学家马特维·坎加洛夫（Matvey Khangalov）的许多著作，都已经成了历史性的著作，也就是说，他们成了老者们关于他们早年故事的报道。

相反，在当时每一个布里亚特部落每年至少会组织三次公众仪式（一次在春天，一次在夏天，一次在秋天，但有时会很频繁）（Mikhaylov 1965: 11; Dashiyeva 1985: 4）。他们要么是进行泰拉甘（taylagan），即部落的萨满呼唤氏族祖先和保护者的神灵，向他们献祭（主要是奶酒、塔尔苏姆^①、其他乳制品，以及氏族成员奉上的马或公绵羊等祭品），并请求神灵保护氏族成员，保佑他们牲畜的繁衍；要么会举行流程相同的祭敖包仪式，为了呼唤佛教的神灵，但不会有动物祭品，因为这个仪式是由佛教喇嘛而不是萨满主持的，所以不会杀生。但无论如何，这两个祈祷仪式之后总会有宴会、舞蹈，以及三项体育比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祭祀仪式在布里亚特人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中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在他们狩猎和畜牧混合的生存经济中，后者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法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哈马扬清晰解释的那样，他们在魔法活动中结合了两种“逻辑”：狩猎人的“魔法逻辑”和畜牧人的“生产逻辑”。猎人从自然中直接获取，即他们会借助游戏直接与自然的神灵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他们在交流中是平等的伙伴——在这种交流中，双方都试图欺骗对方，换言之，即互相愚弄。因此，猎人的谈判者（即他们的萨满巫师）基本上是在玩游戏；然而，如上所述，这里有一个强制性的基础：他们被要求模仿被捕猎的动物（即想带走的动物），并（象征性地）与一位雌性动物神灵达成婚

^① 译者注：布里亚特人用来祭祀的一种奶酒。

姻关系,因为在这些谈判中,双方都必须成为平等的伙伴。

然而,对畜牧者来说,牲畜群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他们生产并继承它们。因此,他们并不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取(Hamayon 1994: 78—85, 2001: 133—144, 2003: 63—66)。换言之,对于他们,自然界(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说)变成了一种生产手段。然而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拥有这种手段。因此,他们必须请求他们的祖先、保护神或佛教神灵,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因此,他们并不是神灵的平等伙伴,而是他们的下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和他们一起游戏,而必须向他们祈祷;为什么他们不能从他们身上掠夺,而必须给他们礼物,以便赢得或保持他们的好感。他们通过献祭一种动物——一匹马、一只公羊和(或)奶制品——来赢得或保持神灵的好感,而这两种动物都是他们在神灵的帮助下生产的。

这一祭祀仪式之后的盛宴,除了开玩笑、跳舞和唱歌之外,还必须包括体育比赛,其中,固定的模仿野生动物和被猎杀的象征(即摔跤手表演的鹰舞、象征啮齿动物的射箭靶等),显示了猎人典型的“巫术逻辑”并没有消失。但是明确地说,现在的运动员和萨满教徒,当然也包括佛教喇嘛,都不再将他们的活动视为是一种与“无形的”或“非物质性的存在”进行的谈判并欺骗他们的仪式,而是通过向神灵赠送礼物,给他们带来欢乐。现在参加仪式的人希望通过这些礼物能得到神灵的回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参加仪式的人需要向他们的神灵表明,一个人的健康和强大是由于他们(即灵和[或]神)的关心和保护,所以能够向他们呈现这些礼物。而举办比赛的目的是证明和显示他们照顾得成功及其必要性。人们相信,如果神灵对所给予的礼物和向他们展示的娱乐感到满意,他们就会进一步保护那些送礼和玩游戏的人(Dashiyeva 1984: 136; Kabzin'ska Stawarz 1987: 53; Alekseyev and Gombozhapov 2000: 151—152; Dugarova 2004: 13, 16)。因此,体育比赛也被视为是对“崇高”的礼物,是象征性的牺牲,是“在手势和姿态上,在娱乐与竞赛中奉献自己”。

从考虑自己“在本质和地位上[……]相似”到早期仪式中萨满祭司可以玩耍和欺骗的动物神灵,再过渡为恳求“神”(即“被认为本质上与众不同,地位更高的超自然生物”,再次使用本文的同行评议者非常恰当的措词),对布里亚特人来说,并不是迈出了一大步。

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灵魂以及动物、植物、山脉、水域和自然界所有其他实体的灵魂之外,他们始终相信有一个完整的万神殿。因此,他们的萨满

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tengrianism（腾格里主义）或 tengrism（腾格里教），他们相信有 99 个居于天国的 *tengri*（腾格里，即天神），其中 55 个仁慈的住在西方，44 个邪恶的住在东方天堂，他们都有儿子和女儿，要么在地面上流浪，要么在地下世界游荡。对一个布里亚特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恐惧、祈祷或简单地崇拜这些神圣的生物，是很正常的。

几个世纪以来，布里亚特人为了确保他们的生存，一直在进行上述的泰拉甘（*taylagan*）和祭敖包仪式。简而言之，这些可以被称为基于亲属团体的祭祀祈祷仪式，最先由萨满主持，后来由佛教喇嘛主持，但仪式后必然会举行一场宴会，并进行摔跤、射箭、赛马这三种布里亚特传统的体育项目比赛。一些最早关于布里亚特人的民族志报告记录了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如 18 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约翰·乔治·格梅林（*Johann Georg Gmelin*）的《*Reise durch Sibirien*》^①（*Gmelin 1752: 21–26*）和约翰·戈特利布·格奥尔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的《*Bemerkungen einer Reise im Rußischen Reich*》^②（*Georgi 1775: 316–319*），还有 19 世纪上半叶瓦西里·帕辛（*Vasiliy Parshin*）的《*Poyezdka v zabaykal'skiy kray*》^③（*Parshin 1844: 61–63*）。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前几十年，由俄罗斯和布里亚特的作家、学者、旅行家、流亡者、当地历史学家等创作的关于布里亚特人丰富的民族志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对这些事件相当多的、且极为详细的描述（见 *Khangalov 1880; Loginovskiy 1897; Golovachev 1902: 112–113; Shagdarov and Ochirov 1909* 等）。从当时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泰拉甘活动不仅是每个部族为内部成员举行的，而且其中还有一些由数个部落的成员共同参加，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一起（*Potanina 1912: 13; Dashiyeva 2001: 29*）。

泰拉甘是该仪式的原初形式，如上所述，祈祷部分是由氏族的萨满主持，奉献给氏族祖先和守护神的主要祭品是马或公羊。祭祀敖包仪式是它的佛教版本，其中佛教僧侣取代了萨满，人们向佛教神灵祈祷，但不提供动物祭品，只有 *tsagaan idee*（察干伊迭），“白色食物”（即乳制品）作为祭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仪式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动词“*taykhu*”（泰昆），也是由名词“*taylagan*”（泰拉甘）派生而来，在包括布里亚特在内的所有蒙古语言中都有“通过献祭来表示敬意”的意思（参见 *Babuyeva 2004: 192*）。在第一种情形

① 西伯利亚之旅（德语）。

② 俄罗斯帝国之旅评论（德语）。

③ 前往贝加尔湖领地（俄语）。

下，布里亚特人向他们的萨满教神灵供奉祭品，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向佛教神灵供奉祭品，但两种仪式目的都一样：意图维持这些超自然神灵的仁慈和支持，他们相信这些神灵是保佑他们生存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展现了那些 17 世纪晚期从西藏和蒙古来到布里亚特的僧侣，是如何将东方的布里亚特人（即贝加尔湖以东的五分之四布里亚特人）转变为佛教徒的，他们通过举行萨满教的活动，将其融入到佛教信仰体系和仪轨中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布里亚特人古老信仰中的诸多 *tengri*（腾格里，即居住在天堂、大地和地下世界的神）确实帮助佛教僧侣取得了成功，因为许多布里亚特人都接受佛教的神灵现在已经取代了古老神灵的位置，并以同样的方式保护他们。尽管如此，佛教的神职人员并不能消灭非“佛教化（*Buddhistianized*）”的萨满教。萨满是一直以来都有的，直到今天人们还经常求助于萨满。

尽管如此，藏传佛教喇嘛在传教方面取得的成功还是令人瞩目的。因为到了 18 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东部布里亚特人都皈依了佛教，这一切只用了大约 100 年的时间。喇嘛们利用布里亚特人对三种传统体育运动的热爱进行传教，这对传教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组织的这些运动比赛，不仅作为祭敖包仪式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寺院中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最突出的是每年仲夏举行的 *Maydar khura*——这是一项对弥勒佛（*Maytrea*），即未来佛的礼赞仪式，也是一年中佛教最高神圣仪式之一。此外，当有来自西藏或蒙古的高僧访问 *Datsanis*（布里亚特人对他们的佛教寺院的称呼）时，也经常组织这三项运动比赛以礼遇贵客。

后来，寺院有了自己的摔跤手，喇嘛会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的东西，以便他们能够专心练习摔跤。换一种较为现代但十分贴切的说法——佛教神职人员成为了这些运动的有力赞助商。结果，佛教寺院中的这些比赛经常会吸引大量布里亚特运动员及爱好者，从而为这些寺院及佛教神职人员的繁荣发展，以及佛教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人中的快速兴起做出了贡献。但是，定居在湖西的布里亚特人的情况却十分不同。在那里，佛教传播活动的时间很晚：仅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此之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曾试图将那里的布里亚特人转变为他们的信徒。然而，俄罗斯基督教神父的成功率远不及在东部布里亚特人传教的蒙古和藏传佛教的喇嘛们。从 17 世纪俄国征服该地区到 19 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中，他们仅将大约 40% 的西布里亚特人转变为俄罗斯东正教徒（*Hundley* 2010: 247; *Mikhaylov* 1994: 122），甚至这些人并没有成为新信仰的真正信徒。例如，在 1905 年全帝国起义后，尼古

拉二世下令允许宗教自由，立即就有大批的宗教信徒离开教会，这点就十分明显（Zhukovskaya 1995: 83）。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西布里亚特人仍然是萨满教徒。甚至有些曾经或现在仍是东正教会成员的人，通常也不会放弃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和崇拜（Humphrey 1983: 30; Montgomery 2005: 72）。因此，在西布里亚特人中出现了融合的宗教习俗，但其中新宗教（大多数情况下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东部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远不及佛教。因此，直到今天，萨满教仍是他们主要的宗教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

当地的领导人和机构也将三种传统的布里亚特运动用于其统治的目的。可汗和氏族领袖经常招募最优秀的摔跤手和弓箭手作为他们的禁卫兵骑兵团（life guards）和精锐部队，并且还经常在战役结束后组织“男儿三技艺”比赛（Zhukovskaya 1988: 59; Bardamov and Fomin 1998: 141; Darzha 2003: 38; Babuyeva 2004: 198; Krist 2014: 30）。在和平时期，富有的布里亚特氏族首领会在比赛开始前的几个月里为选定的摔跤手滋补身体，并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Khangalov 1880: 31）。

沙皇政府也曾利用它们，这里有一个鲜明的例子。1814年夏天，在恰克图（Kyakhta）（当时与中国接壤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小镇）举行了庆祝巴黎陷落和两年前战胜拿破仑事迹的大型活动。在这项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中，核心活动就包括布里亚特“男儿三技艺”的大型比赛，还有一场有上百匹马参与的赛马活动（Shchapov 1908: 710—712）。

然而，在沙皇统治之后，布里亚特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却因为政治目的而达到了巅峰。从最早的统治开始，苏联各地和党的干部就将这些运动作为aimak（艾麦科）^①进行组织，即名为苏尔哈班（Surkharban）的地区运动会，每年在新成立的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乌金斯克（Verkhneudinsk）（后来更名为乌兰-乌德Ulan-Ude）举行大型苏尔哈班共和比赛。从1930年代初开始，他们还组织了集体农庄（kolkhoz）运动，即重新强制建立的集体农场。这些活动被广泛用于国家和政党的宣传，作为上述组织计划的预期结果，这些运动员以其工作单位的成员或特定行政单位的居民身份参加比赛（Humphrey 1983: 381）。因此，这些体育竞赛以前主要是亲属群体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新苏联生产和行政单位的事件，并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Ocherki istorii kul'tury Buryatii 1974: 287; Humphrey

① 译者注：蒙古共和国为行政目的而划分为18个最大的地区之一。

1983: 380—382; Vatanabe 1994: 54)。通过对规则、服装和装备的修改,传统的布里亚特体育运动变得与国际体育运动非常相似,这使它们成为了后者的预备演习,并作为一项公开反对“民族主义或分裂主义”的措施(Eichberg 1991, 1998: 134)。这样,在苏联统治的70年中,这些体育运动丧失了许多独特的布里亚特民族特色,但“男儿三技艺”遭到最严重的世俗化和彻底的减损还是来自前苏联领导们的影响。由于国家和政党组织的比赛是独立的活动,与任何宗教仪式都不相关,因此这种比赛被剥夺了所有宗教元素,甚至包括 *devekh* 中摔跤手的鹰舞。

尽管如此,布里亚特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传统,而且苏联人在企图消除其宗教信仰方面显然失败了。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尽管萨满和喇嘛都受到迫害,他们的信仰活动也受到严重挫败和阻碍,而且在1930年代几乎所有寺庙都被关闭和摧毁的状态下,有些泰拉甘(作为亲属的祭祀仪式)依然以传统方式进行,其中有些甚至伴随着传统的体育比赛(Mikhaylov 1971: 66—67)。在19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最终在苏联创造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时,正如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指出的那

样,“泰拉甘”和“祭鄂博”仪式都出现了“爆发”,尽管这些活动有着明确的宗教目的,但当局却不再试图制止或阻碍他们(Humphrey 1989: 168; Musch 2006: 19)。当局态度的完全转变也体现在1987年由布里亚特 ASSR 的美术博物馆购买和展出的抽象装饰金属雕塑上。该雕塑由布里亚特金匠拉德娜·桑吉托夫(Rdna Sanzhitov)制作,名为“苏尔哈班(Surkharban)”。该雕塑对萨满教的世界之树、天体、箭的渲染,向观者清晰地揭示了这些体育赛事的原始宗教意义:人们试图与神圣的天神相沟通(图5)。



图5 布里亚特锻冶匠人拉德娜·桑吉托夫的雕塑“Surkharban”(苏尔哈班),铁艺,1987年。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由布里亚特共和国桑皮洛夫美术馆提供)

1991年苏联最终解体后,是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管理(现为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服务)第一个采取措施让布里亚特体育比赛重新传统化。例如,在苏哈尔

班共和比赛中，废除了苏联时期为布里亚特摔跤引入的时限和记分制度，而增加了一项针对高级弓箭手的比赛——要求他们穿着传统的布里亚特服装，使用传统弓箭而不是现代塑料材质弓箭。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两个半个世纪中，不是由国家体育机构，而是由布里亚特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佛教机构的喇嘛，“俄罗斯佛教传统僧伽”（翻译过来就是“僧侣集会”或“僧侣团体”）改变了布里亚特的传统体育。堪布喇嘛丹巴·阿尤谢耶夫（Khambo-lama Damba Ayusheyev）领导下的喇嘛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他们喜爱的方式和特定风格，让三项传统的布里亚特运动蓬勃发展并使其重新传统化。最重要的是，他们再一次将比赛与佛教仪式联系在一起。1996年，Eryn Gurban Naadan（艾音·古尔班·纳丹，这个传统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男儿三技艺”，此后也被喇嘛们使用）成为了伊沃金斯克寺庙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1997年，举办了同样的运动会，以纪念蒙古高僧到访伊沃金斯克和基任加（Kizhinga）的寺庙；2003年以来，这些运动又再次成为迈达尔·呼拉尔（Maydar Khurals）的组成部分。迈达尔·呼拉尔是夏季的主要佛教仪式，在伊沃金斯克的寺院以及苏维埃时代以前的（如上所述）其他寺院中也是如此。此外，2008年以来，每年都在布里亚特东部Egituy的寺院举办著名的艾音·古尔班·纳丹，在那里保存着著名的檀香木佛像赞丹珠（Zandan Zhuu）；自21世纪前十年中期以来，布里亚特共和国及其他人口众多的布里亚特地区举办了更多神圣的佛教仪式，其中许多是每年举办一次。因此，佛教神职人员为这些运动会创建了一个年度的节日（即一系列的艾音·古尔班·纳丹），从4月开始，到9月以该季节的高潮结束，以纪念Dashi-Dorzho Itigelov（1852—1927年），第十二任堪布喇嘛（Kamboolama），尽管他已于90多年前去世，但他的尸体并没有腐烂，原因迄今未知，且一直在伊沃金斯克的寺庙展出。

因此，在他们组织绝大多数比赛的同时，佛教传统僧伽已经从国家机构手中接管了传统的布里亚特运动，至少在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布里亚特人地区如此。所有的这些艾音·古尔班·纳丹都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组织的：所有弓箭手都必须穿着传统的布里亚特服装，并或多或少地使用传统的布里亚特弓；赛马的赛程很长，从7公里到28公里不等；摔跤运动员必须佩戴和使用传统的腰带，并遵守重新建立的传统规则，包括必须进行的表演——鹰舞（图6）。



图6 2011年夏季在布里亚特州南部的明斯克寺庙组织的“艾音·古尔班·纳丹”期间的青年摔跤比赛。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在定居于贝加尔湖以西的布里亚特人之间，情况又有所不同。正如所描述的，萨满教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宗教信仰，但今天只有为数不多的寺院和少数喇嘛。在那儿，由于佛教神职人员的地位低下，几乎没有僧侣，国家组织的苏尔哈班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布里亚特传统体育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毫无疑问，萨满教的另一种传统却在那里复兴了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 Yordinskiye Igry，即“约丁的游戏”。在靠近贝加尔湖的西岸一个40米高的圆顶形山丘上，该地区主要居民是布里亚特人。2000年，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间歇之后几乎完全消失的大型传统，全布里亚特（即跨氏族）泰拉甘活动，在这个被许多布里亚特人认为处于“世界轴线”的小山附近，伴随着大型的传统体育比赛得以复苏（Sodnompilov 2000；Babuyeva 2004：176—180）。从2005年到2011年，此后每隔一年重复举办一次，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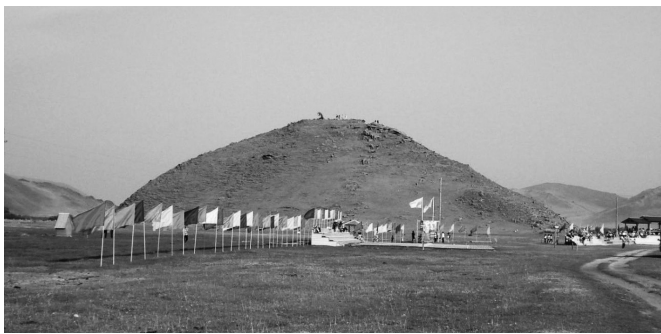


图7 2011年“约丁游戏”第一日早晨的“约丁山”。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每次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一起祭拜，来自各地和跨区域萨满教协会的几十位萨满教徒在耶德山脚下进行祭祀（图8）。但通常为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的主要仪式高潮是约克（*yokhor*）——一种典型的布里亚特圆舞。约克由男女代表共同起舞，他们拉着手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圈，并围绕代表世界轴心或世界树的物体顺时针移动，人们相信通过仪式舞蹈，就能将这个世界及其居民与天堂及神圣之物联系起来。这类圆圈舞及其宗教的意义也是埃文斯（Dugarov 1991: 144）和定居在布里亚特北部西伯利亚针叶林的其他族群（Babuyeva 2004: 180—181）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和其他蒙古人相比，只有布里亚特人跳这种舞（Babuyeva 2004: 181），这是“狩猎巫术”的强大作用的另一证明，换句话说，就是与神灵的直接交流。



图8 2011年，一群布里亚特萨满教徒在约丁山脚下的“约丁游戏”中进行祭祀祈祷仪式。

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图9 布里亚特人和其他信徒在“约丁山”上跳起巨大的“约克（*yokhor*）”圆圈舞，以迎接来年（2011年）。摄影：史蒂芬·克里斯特

在约丁游戏中, 约克是围绕约丁山进行的舞蹈 (图 9), 为此至少需要 700 位舞者才能闭合圆圈, 这被认为是确保仪式成功的必要条件。人们相信, 封闭的圈子可以抵御恶魔, 从而使来年成为美好的一年 (Dugarov 1991: 144; Babuyeva 2004: 178) (图 9)。在舞蹈中, 一位当地已经在任 20 余载的布里亚特萨满大祭司瓦伦丁·哈格达耶夫 (Valentin Khagdayev) (他对游戏的复兴也发挥了领导作用), 将作为代表站在山顶上, 呼唤神灵并向他们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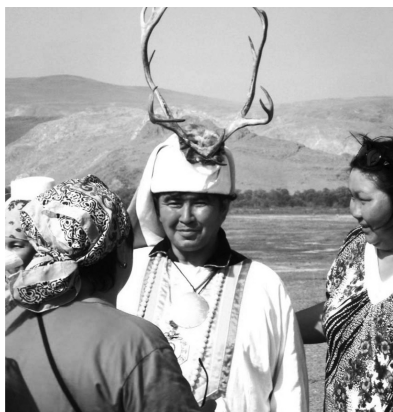


图 10 布里亚特萨满祭司瓦伦丁·哈格达耶夫 (Valentin Khagdayev) 从山上完成祈祷仪式下来后, 与“约克”舞表演队伍一起 (2011 年)。摄影: 史蒂芬·克里斯特

他戴着鹿角冠, 以此模仿一只被狩猎的动物 (图 10)。

在活动达到高潮之前, 在山脚下的舞台上要进行为期两天的音乐会和舞蹈节目表演, 人们为此欢呼雀跃。也是在这为期两天的比赛中, 会举行布里亚特的三种传统运动以及其他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运动 (例如雅库特跳台)。因此, 这一活动总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 (主要但不限于布里亚特人), 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规模萨满教仪式 (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仪式之一), 其中包括传统上认为所有必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体育运动竞赛 (图 11)。



图 11 2011 年“约丁”山脚下“约丁游戏”中的摔跤手。摄影: 史蒂芬·克里斯特

五 结 论

鉴于体育和仪式之间有据可查的主要联系，可以在逻辑上得出结论，它们有着共同起源，而且它们在许多族群中曾有过，甚至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巫术功能。本文主要分析了布里亚特三种传统体育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宗教意义。

贝加尔湖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石艺术作品证明，体育比赛——至少是摔跤比赛——在早期的布里亚特地区也被用作仪式目的。中世纪（辽代）的文字资料证明了它们的历史延续性，而且，在专家们（即萨满）进行旨在确保生育和生存的仪式中，体育（主要是射箭比赛），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 19 世纪，20 世纪和 21 世纪民族志资料的分析（包括我自己的观察）证明，布里亚特萨满教的体育活动和仪式有着相同的最初目的，一方面，它使得想象中的宇宙和神圣事件更容易被人们察觉和感知，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提供了影响这些神圣事务的可能性。此外，我已经表明，布里亚特人传统的狩猎和畜牧业混合经济也通过两种不同的巫术活动体现在仪式中：一种是猎人的巫术活动（即与想象中的神圣生物直接谈判），另一种则是畜牧业的巫术活动（即恳求恩典）。

这也表明，无论是（西藏）佛教还是基督教（俄罗斯东正教），包括 17 世纪以来喇嘛和僧侣的传教活动，以及大多数布里亚特人皈依的这种或那种宗教，都没有能够消除布里亚特人赖以生存的萨满教信仰，以及体育比赛在萨满教仪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佛教喇嘛从根本上将这些仪式和体育活动完全纳入了佛教的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中，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意义。但受洗的布里亚特人中，向基督教的转化仍然只停留在一个非常形式化和肤浅的水平上，因此并不影响他们的萨满信仰和实践，人们依旧像从前一样行事。

苏联将近 70 年的镇压以及对各种宗教活动的阻碍也未能将其彻底消灭。可以这样说，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布里亚特的三大传统体育活动再次蓬勃发展，而且通常伴随着各种佛教仪式和萨满教仪式，包括每两年在约丁山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布里亚特全民大型运动会，实际上就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祈祷仪式，其中也包括传统的体育赛事。

所以说，这三项传统的体育活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证明了所从事的

体育运动是出于宗教目的,甚至即便在当代,有些积极的体育运动者也会将运动视为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圣生物交流的媒介。

参考文献

- Alekseyev, N. A. and A. G. Gombozhapov
2000, Obo takhilgan—Gornoye moleniye aginskikh buryat. In *Etnografiya narodov Sibiri i Mongolii*. Ulan-Bator and Ulan-Ude: Mongolyn Shinzhlekh Ukhhaany Akademi, Institut mongolovedeniya, buddologii i tibetologii RAN.
- Babuyeva, Valentina D.
2004, *Material'naya i dukhovnaya kul'tura buryat*. Ulan-Ude: Tsentr sokhraneniya i razvitiya kul'turnogo naslediya Buryatii.
- Bardamov, Gavril B. and Vladimir A. Fomin
1998, Vozrozhdeniye natsional'noy traditsii v sisteme sostyazatel'noy deyatel'nosti. In *Vozrozhdeniye traditsionnykh kul'tur narodov Buryatii: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y konferentsii 14–15 maya 1998 g.* Ulan-Ude: Pravitel'stvo Respubliki Buryatiya, Rossiyskaya Akademiya nauk Sibirskoye otdeleniye, Baykal'skiy institut prirodopol'zovaniya, pp. 140–146.
- Blanchard, Kendall and Alyce T. Cheska
1985, *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 Introduction*. South Hadley: Bergin & Garvey.
- Calhoun, Donald W.
1987, *Sport,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 Culin, Stewart
1907, Games. In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s: North of Mexico; Part 1*. Edited by Frederick Webb Hodg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483–486.
- Damm, Hans
1960, Vom Wesen sog. Leibesübungen bei Naturvölkern. Ein Beitrag zur Genese des Sportes. *Studium Generale* 13, pp. 1–9.
- Darzha, Vyacheslav

2003, *Loshchad' v traditsionnoy praktike tuvintsev-kochevnikov*. Kyzyl: TuvIKOPR SO RAN.

Dashiyeva, Nadezhda B.

2001, *Buryatskiye taylagany (opyt istoriko-etnograficheskogo issledovaniya)*. Ulan-Ude: Izdatel'sko-poligraficheskii kompleks VSGAKI.

1985, Traditsionnyye obshchestvennyye prazdniki buryat: Opyt istoriko-etnograficheskogo issledovaniya. Avtoreverat dissertatsii, Institut etnografii im. Miklukho-Maklaya AN SSSR. Nauka, Moskva.

1984, K voprosu o traditsionnykh prazdnikakh v Buryatii. In *Polevyye issledovaniya instituta etnografii 1980—1981*. Edited by Sev'yan I. Vaynshteyn. Moskva: Nauka, pp. 134—142.

Dugarov, Dashinima S.

1991, *Istoricheskiye korni belogo shamanstva (na materiale obryadovogo fol'klora buryat)*. Moskva: Nauka.

Dugarova, Radzhana D.

2004, Traditsionnyy sportivnyy prazdnik “Eryn gurban naadan” (“Tri igrishcha muzhey”) i ego mesto v kul'ture Buryat. Avtoreferat dissertatsii,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imeni N. Miklukho-Maklaya RAN, Moskva.

Eichberg, Henning

1998, A Revolution of Body Culture? Traditional Games on the Way from Modernization to “Postmodernity”. In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by Henning Eichberg*. Edited by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London: Routledge, pp. 128—148. First published 1991, in *Eclipse et Renaissance des Jeux Populaires*. Edited by J.-J. Barreau and Guy Jaouen.

Firth, Raymond

1930, A Dart Match in Tikopia: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Primitive Sport. *Oceania* 1: 64—96.

Forsyth, James

1992,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Russia's North Asian Colony 1581—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orgi, Johann Gottlieb

1775, *Bemerkungen einer Reise im Rußischen Reich im Jahre 1772*. Erster

Band. Sankt Petersburg: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Gmelin, Johann Georg.

1752, *Reise durch Sibirien von dem Jahr 1733 bis 1743*. Dritter Thei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Golovachev, Pyotr M.

1902, *Sibir'. Priroda, lyudi, zhizn'*. Moskva: Yu. I. Bazanova.

Hamayon, Roberte N.

2016, *Why We Play—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Chicago: Hau Books.

2003, Game and Games, Fortune and Dualism in Siberian Shamanism. In *Shamanism: A Reader*. Edited by Graham Harvey. London: Routledge, pp. 63—68.

2001, Tricks of the Trade or How Siberian Hunters Play the Game of Life-Exchange. In *Expanding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xchange: Deception, Self-Deception and Illusions*. Edited by Caroline Gerschlager.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hp. 8, pp. 133—147.

1994, Shamanism in Siberia: From Partnership in Supernature to Counterpower in Society. In *Shamanism, History,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Nicholas Thomas and Caroline Humphre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76—89.

Harris, Janet C., and Roberta J. Park.

1983,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cultural Study of Play, Games, and Sports. In *Play, Games and Sports in Cultural Contexts*. Edited by Janet C. Harris and Roberta J. Park.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pp. 1—36.

Humphrey, Caroline

1990, Buryats. In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Edited by Graham Smith. London: Longman, pp. 290—302.

1989. Population Trend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mong the Burya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beria: People and Resources*. Edited by Alan Wood. Basingstoke: Mac Millan, pp. 147—176.

1983, *Karl Marx Collective: Economy, Society and Religion in a Siberian Collective Fa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dley, Helen S.

2010, *Defending the Periphery: Tsarist Management of Buriat Buddhism. The Russian Review* 69, pp. 231—250. [CrossRef] Jensen, Adolf E. 1947. Wettkampf-Parteien, Zweiklassen-Systeme und geographische Orientierung. *Studium Generale* 1, pp. 38—47.

Kabzin'ska-Stawarz, Iwona

1987, Eriin Gurvan Naadam—‘Three Games of the Menin Mongolia’. *Ethnologia Polona* 13, pp 45—89.

Kamphausen, Hans.

1972, Traditionelle Leibesübungen bei autochthonen Völkern: Ein problemorientierter Überblick. In *Geschichte der Leibesübungen*. Edited by Horst Ueberhorst. Berlin: Bartels- und Wernitz-Verlag, vol. 1, pp. 64—109.

Khangelov, Matvey N.

1880, Natsional'nyy prazdnik u buryat. *Izvestiya Vostochno-Sibirskago otdela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11, pp. 30—34.

Kolarz, Walter

1954,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Far East*,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Körbs, Werner

1960, Kultische Wurzel und frühe Entwicklung des Sports. *Studium Generale* 13, pp. 11—21.

Krader, Lawrence

1954, Buryat Religion and Society.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0, pp. 322—351. [CrossRef] Krist, Stefan. 2014, Wrestling Magic: National Wrestling in Buryatia, Mongolia and Tuva in the Past and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31, pp. 423—444.

Krist, Stefan

2018, Review of *Questioning Play. What Play Can Tell Us about Social Life*, by Eichberg, Henning, and of *Why We Pla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by Hamayon, Roberte. *Anthropos* 113/1, pp. 296—298. [CrossRef]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khagvasuren, G.

1998, Fisicheskaya kul'tura v traditsiyakh gosudarstvennoy politiki Mongolii.

In *Fizicheskaya kul'tura i sport: Istoriya, sovremennost', perspektivy: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y konferentsii*. Edited by Semën V. Manturov. Ulan-Ude: Izdatel'stvo Buryatskogo gosuniversiteta, pp. 14—17.

Loginovskiy, Karp D.

1897, Igrы buryat Vostochnago Zabaykal'ya. *Zapiski chitinskago otdeleniya priamurskago otdela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2, pp. 45—56.

Mathys, Fritz Karl

1958, *Kultische Ursprünge des Sports*. Celle: Pohl.

Mauss, Marcel.

1992, Techniques of the Body. In *Incorporations*, vol. 6 of *Zone*. Edited by Jonathan Cary and Sanford Kwinter. New York: Zone, pp. 455—477. First published 1935. French under the title “Les techniques du corps.”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32, pp. 271—293.

Mikhaylov, Taras M.

1994, Buryaty. In *Narody Rossii: Entsiklopediya*. Edited by Valeriy A. Tishkov. Moskva: Nauchnoye izdatel'stvo “Bol'shaya Rossiyskaya Entsiklopediya”, pp. 118—122.

1971, Shamanskiye perezhitki i nekotoryye voprosy byta i kul'tury narodov Sibiri. In *Voprosy preodoleniya perezhitkov lamaizma, shamanizma i starobryadchestva*. Edited by A. A. Belousov. Ulan-Ude: Buryatskoye knizhnoye izdatel'stvo, pp. 56—68.

1965, Ob obychakh i traditsiyakh buryat v sovremennyy period. In *Kul'tura i byt narodov Buryatii*. Ulan-Ude: Buryatskoye knizhnoye izdatel'stvo.

Montgomery, Robert W.

2005, *Late Tsarist and Early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ultural Policy: The Buryats and Their Language*.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Musch, Tilman

2006, *Nomadismus und Sesshaftigkeit bei den Burjaten: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m Spiegel zeitgenössischer Folklore*. Frankfurt am Main: Lang.

Müller, Klaus E.

2006, *Schamanismus: Heiler, Geister, Rituale*, 3rd ed. München: Beck,

pp. 8—9.

Ocherki istorii kul'tury Buryatii

1974, Edited by Dashi D. Lubsanov et al. Ulan-Ude: Buryatskoye knizhnoye izdatel'stvo, vol. 2.

Okladnikov, Aleksey P.

1974, *Petroglify Baykala: Pamyatniki drevney kul'tury narodov Sibiri*. Résumé in English. Novosibirsk: Nauka.

Parshin, Vasilii

1844, *Poyezdka v zabaykal'skiy kray*. Chast' pervaya. Moskva: Tipografiya Nikolaya Stepanova.

Potanina, Aleksandra V.

1912, *Rasskazy o buryatakh, ikh vere i obychayakh*, 2nd ed. Moskva: Tipografiya K. L. Men'shova.

Reshetnikov, Anatolii F., and Zinaida I. Rabetskaya

2007, Istoricheskiy put' vzniknoveniya i razvitiya natsional'noy bor'by na osnove petroglifov baykal'skogo regiona. *Vestnik Buryat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Vyp. 8, pp. 213—216.

Salamone, Frank

1977, Religion as Play—Bori, a Friendly 'Witchdoctor'. In *The Study of Pla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David F. Lancy and Allan Tindall. West Point: Leisure Press, pp. 158—167.

Sands, Robert R.

2010, Anthropology Revisits Sport through Human Movement. In *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d Human Movement: A Bio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obert R. Sands and Linda R. Sand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pp. 5—37.

Shagdaron, S.-D., and B.-D. Ochirov

1909, Iгры i uveseleniya aginskikh buryat. *Zapiski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icheskago obshchestva po otdeleniyu etnografii* 34, pp. 465—482.

Shchapov, Afanasiy P.

1908, Sibirskoye obshchestvo do Speranskago. In *Sochineniya A. P. Shchapova*.

Sankt-Peterburg: Knigoizdatel'stvo M. V. Pirozhkova, pp. 643—717.

Sodnompilov, Dorzhi

2000, Yordynskiye igry na Ol'khone. *Inform Polis*, July 9.

Vatanabe, Khibi

1994, *Obryady i politicheskaya integratsiya u buryat*. Tokio.

Wittfogel, Karl A., and Chia-Sh “eng F “eng.

1949,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vol. 36.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York: Lancaster Press.

Zhukovskaya, Natal'ya L.

1988, *Kategorii i simbolika traditsionnoy kul'tury mongolov*. Moskva: Nauka. Zhukovskaya, Natal'ya L. 1995. Na perekrestke trekh religii: Iz istorii dukhovnoy zhizni buryatskogo sela Tory. In *Shamanizm i rannye religioznye predstavleniya*. Edited by Dmitriy A. Funk.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 pp. 76—87.

Shamanic Sports: Buryat Wrestling, Archery, and Horse Racing

Stefan Krist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ligious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and present forms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s of the Buryats—a Mongolian ethnic group settled in Southern Siberia, Northern Mongolia, and North-Eastern China. Both historically and in our time, their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been closely linked to shamanic rituals.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functions of these sports competitions for Buryat shamanic rituals—why they have been, and still are, an inevitable part of these rituals. They are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rituals, which aim to trick and/or please the Buryats' spirits and gods in order to get from them what is needed for survival. The major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Buryats' construc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ir imagined spiritual enti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ir sports competitions are

described. The effects of both economic changes—from predominantly hunting to primarily livestock breeding—and of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world views—from shamanism to Buddhism and from Soviet Communist ersatz religion to the post-Soviet revival of shamanism and Buddhism—are described.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recent revival of these sports' prominent role for Buddhist and shamanist rituals.

Keywords: Buryats; cultic sports; shamanism; Buddhism; post-Soviet revival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1.11

ISBN 978-7-5426-7642-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55414 号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642-9/D·523

定 价 / 8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